

►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美国华人社区汉语传播研究

■ 陈颖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美国华人社区汉语传播研究

陈 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华人社区汉语传播研究/陈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0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307-19282-9

I . 美… II . 陈… III . 华人—汉语—传播学—研究—美国

IV .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581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9.5 字数: 280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282-9 定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美国是一个海外移民占多数的国家，也是东南亚以外世界第二大华人聚居地。华人移民美国一百多年来，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已经逐渐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大家庭一个重要的少数族群。学界当前关于美国汉语传播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这些研究的内容多为汉语课堂教学技巧、教学方法等，从华人角度探讨汉语美国传播的成果至今还比较少。汉语有官话与方言之分，早年华人在美国主要使用的是汉语方言，随着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华人社区中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沟通各方言群体的共同语，这时官话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崛起以及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移民赴美留学、经商、工作和定居，汉语普通话在美国华人社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以汉语普通话为代表之一的“华语”打破了华人社区原有的方言壁垒，弥合了长久以来被传统强势汉语方言所割裂的华人社群，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华人的认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汉语的美国传播并不仅仅表现为中国在美国开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进行汉语教学，事实上，随着汉语普通话逐渐成为美国华人社区的主流强势语言，汉语美国传播所涵括的内容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所涉及的层面也在不断地扩大。

作为华语在美国使用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华人社区能够成为考察美国汉语传播的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和着眼点。一方面，美国华人来源广泛，背景丰富，除了有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直接移民过来的，也有经由东南亚、欧洲、中南美洲、非洲、澳洲等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漂洋过海并繁衍至今的第二、第三代甚至第四、第五代子孙后代。海外华语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先遣队，时刻影响着其周围的语言社会面貌。英语、汉语、中国各地方言以及世界

其他民族语言共存的地理单元，是华人社区的语言状况能够汉语在美国演化发展的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华人是美国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者，也是美国华文教育及相关活动的倡导者和主要受益者，华人社区作为美国华人移民后代频繁活动的环境，是他们操练中文的场所、开展汉语实践和中华文化体验的天然教室，不仅能折射美国华裔家庭中文教育的成败以及美国华文教育未来走向，还可以见证汉语和中华文化在美国当地社会的影响力。

语言传播始于人口迁移，在语言的保持和传播中，人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关注人和语言传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探讨和发现语言传播的一些深层规律。海外五千万华人华侨，都是汉语的国际传播员，因此海外华人和汉语域外传播之间的互动，能够成为研究汉语国际传播规律的切入点。一直以来，学界对汉语美国传播的研究更多从中文教学或汉语传播政策角度出发，强调对美国汉语教学发展的作用。相比之下，华人对于美国汉语推广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往往不那么受到重视。作为美国汉语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人一直以来都处于美国汉语传播的最前沿：从历史的角度看，华人将汉语带入美国载体，在美国汉语传播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当下和展望未来的角度看，作为汉语及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华人将继续扮演着面向美国当地推广和传播汉语的重要角色。本书以美国华为切入点，阐述和论证华人社区的汉语使用对于推动和促进汉语在美传播的作用，弥补了学界对于美国汉语传播研究长期存在的观察角度之缺位。

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传播，既是全球化的标志，也是全球化的表现，全球化使语言能够借由更多的方式在世界各个地区进行传播。学界当前关于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多属于静态层面的探讨，较多关注的是汉语传播的结果，对全球化背景下汉语传播的动态移动趋势的追踪力度不足。本书借鉴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学派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移动的人”和“移动的语言”的相关理论，基于美国华人社区汉语普通话推广的现状，结合华人移民美国后的活动，对“华语认同”的内涵和层次进行剖析，认为“华语认同”不能简单地表述为说话人对华语的认可，而应体现为说话人在行为和心理两个方面同

时有所表现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即说话人不但使用华语，对华语持积极评价态度，肯定华族在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所处的地位，并且还通过使用华语来达到建构自身华人身份的目的，其本质是华人与各社会要素之间的实践过程，最后在分析华语认同实质的基础上重构全球华语社区模型。这样一来，无论是汉语的国际传播还是全球华语社区研究都可以纳入到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视野中来，从而使汉语变化的动因及趋势都能在“移动的人和移动的语言”的理论下得到较为满意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既丰富了社会语言学关于全球华语社区理论的研究，又能给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推动汉语在美国的传播，对于提升中国软实力，促进和维护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加深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中美各领域的交往都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的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华文报刊传媒一贯被称为美国华人社会传承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然而这些并不只是可供总结经验的历史对象，它们对当今的汉语美国传播还在发生着影响：美国华人社区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不但是华人创办华文教育机构、构建华文传媒平台以及组织华人社团等活动的地方，还可以成为当地外国人学习、操练汉语以及体验中华文化的场所，可以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资源。利用好这些历史资源，是汉语美国传播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学界至今对美国汉语传播的研究多侧重从课堂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教材建设、教学理论等角度开展，或者只研究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华文教育的发展，尚未考虑过将汉语国际传播的推动方——中国政府和拉动方——美国华人相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这个层面上说，本书研究美国华人汉语推广的现状和趋势，能够为学界研究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利用华人社区相关资源，推动汉语在当地传播的规划提供启发。

本书以美国华人社区为观察点，研究汉语在美国华人社区的使用与认同对于汉语美国传播的启示作用。全书第一章首先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华人新移民规模的增长

对于海外华人社区语言发展的影响，接着梳理海外华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阐释美国华人社区对于研究汉语在美国传播的价值。第二章是对言语社区、全球华语社区、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相关理论的介绍，并提出本研究与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与区别。第三章主要是社会语言学的两大研究范式“言语社区”和“实践共同体”的系统对比。第四章先介绍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和现状，接着分析历史上华人对于汉语美国传播的贡献及当前“新华人”对促进美国汉语传播的作用，并对美国华人言语社区做出界定。第五章是对美国华人社区的实证调查，主要考察华人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评价和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第六章在归纳和总结美国华人社区汉语传播的影响因素、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剖析美国华人“华语认同”的内涵。第七章从宏观层面探讨美国华人的“华语认同”与美国华语社区的关系，构建全球华语社区圈层理论并分析其与汉语国际传播影响的共变机制，最后探讨了美国华人社区汉语使用调查对于美国汉语传播研究乃至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启示。

本书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之上的实证研究，也是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传播理论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具体实践，可作为学者开展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海外汉语及其方言研究、言语社区研究的参考，也可让普通读者开拓国际视野，使他们能够了解当今美国华人社会多语环境下不同族群的语言竞争状况，从而对华语尤其是汉语普通话在美国华人社会传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本书以美国华人社区为观察点，因此研究对象自然是华人。近年来中国大陆和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新移民不断涌入美国，这些移民在进入美国之前本身具有华侨身份，而华侨又与华人在历史上、血缘上、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行文方便起见，本书将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人统称为华人，具体来说包括那些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侨，正要或即将转变为美国公民的华人以及来美国留学、工作和定居的华人新移民。

本书部分成果曾发表在由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和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的大型专业学术期刊的《国际汉语学报》(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年)和《海外华文教育》(2016年第2

期),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华侨大学主编的《世界华文教学》(2015年第一辑)以及由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主编的《八桂侨刊》(2014年第4期)等刊物。本次出版对其重新做了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华人移民：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样本.....	6
第三节 华人社区：美国汉语传播研究个案的选择	23
第二章 全球化、华语社区相关理论	35
第一节 言语社区理论及其发展	35
第二节 华语社区理论的发展	43
第三节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	48
第三章 言语社区与实践共同体	52
第一节 言语社区的研究范式	52
第二节 实践共同体的研究范式	63
第三节 两种研究范式的评价	66
第四章 华人社区与汉语传播	68
第一节 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68
第二节 汉语美国传播的华人因素	79
第三节 美国华人的言语社区界定	90
第五章 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	97
第一节 调查总体情况说明	97
第二节 美国华人的语言使用.....	109
第三节 美国华人的语言态度.....	134

第四节 美国华人的语言认同.....	141
第六章 汉语的社区推广与华人的汉语认同.....	154
第一节 汉语在美国华人社区传播的影响因素	
特点及趋势.....	154
第二节 美国华人社会的华语社区界定.....	197
第七章 全球华语社区与汉语国际传播.....	208
第一节 华语认同与美国华语社区.....	208
第二节 汉语国际传播视角下全球华语社区的演变.....	232
第三节 美国华人社区汉语传播研究对我们的启发.....	238
参考文献.....	247
附录 A 中文问卷.....	280
附录 B 英文问卷.....	288
附录 C 录音转写语料.....	299
后记.....	302

第一章 絮 论

全球化背景下，移动的“人”和移动的“语言”成为常态。移民这个概念有两种解释：一种作为名词使用，指的迁往国外永久定居的人；另一种作动词用，指大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徙活动，两种用法和释义都与位置改变有关。而作为语言使用的载体，自然也会随着移民的迁徙而发生量或质的变化。海外华人社区是华人移民繁衍生息的地方，拥有面向域外传播推广汉语、促进中外语言文化交流良好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人文资源，能够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一道共同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整体发展。本章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移动的人对语言的作用”立论，分析当前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变化趋势，阐释美国华人社区研究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汉语美国传播研究的作用。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华人聚居的地区，最集中的除我国本土(包括大陆地区、台湾地区、港澳地区)，还有新加坡的华人区，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区，马来西亚的华人区，泰国的华人区，美国的唐人街区等，这些地区统称为“华人社区”(罗建平，2009)。选择海外华人社区来做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想法始于本人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语言学学科发展趋势的认识。社会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它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社会学，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言学，更不是社会学的语言学或社会的语言学，或者语言学的社会学或语言的社会学，而是为了适应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这种复杂的有机构成而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陈原，1982)。

社会语言学以语言变异为研究核心，通过考察鲜活的、正在被使用着的语言，进一步认识语言的变化和变异的过程、原因、规律，从而预测语言的发展趋势，换句话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追踪那些能够反映语言历时演变的共时变异形式是怎样扩散的，“用现在说明过去”，并且在此基础上预测语言变化的趋势，从而建立起语言变化的解释机制。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不但为语言学增添了一种新的语言观，也为语言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它恢复了语言与言语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为研究多变、复杂的言语现象，提供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实验方法和分析方法。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的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化做了有机的结合，不仅让我们了解到语言发展的结果，而且为我们认识语言变化的过程、途径、原因以及语言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王远新，2005）。

社会语言学自从诞生以来，涌现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成了语言学界的主流学派。赵蓉晖在总结归纳英美语言学界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些成果划分为 5 个主要的社会语言学分支：(1) 以 Labov 和 Trudgill 为代表的社会方言学，亦称经典社会语言学，是一种以社区层面的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研究语言的运用，特别是语言的变化和变异揭示语言结构的微观语言学。该学派以定量研究为主要特征，其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理论至今仍是整个学科的核心。(2) 以 Fishman 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又称宏观社会语言学。该学派把语言问题看作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研究课题包括双语、双言、语库、语码转换、语言忠诚、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等。(3) 以 Hymes 为代表的交际民族志学。该学派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描写语言的运用。(4) 以 Lambert 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心理学。该学派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话语使用者在社会交际中语言的使用和对语言及其变体的态度。其中 Giles 和 Smith 提出的言语适应理论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5) 互动社会语言学。在理论上，该学派被看成是在经典社会语言学基础上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关系密切，这基本上反映了当今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概貌（赵蓉晖，2005：32）。

言语社区理论是当代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分析单位。它在揭示社区内各类语言事实的演变规律，阐明各类要素在言语社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之间的关系，反映言语社区语言与社会共变过程的机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一直以来，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多以“静态”的言语社区为研究对象，而言语社区研究则以变异学派的定量统计模式为主流，随着实证成果的积累及时间的推移，变异研究模式开始受到批评。有学者认为该模式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许多立场和观点经不起推敲。如 Gee(2005: 590-594)认为：“不考虑社会理论，不对具体情况做历史考察，言语社区理论的构建将不会有大的起色。”在他看来，言语社区模式过分强调语言的核心作用，从最早关注言语社区的学者 Bloomfield 强调语言系统，Labov 强调相同的语言规范到 Milroy (1980) 强调语言变异模式，他们无不在强调语言是社区的主要标准，语言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这忽略了言语社区成员除了语言外的其他非语言行为的被边缘化，或者被忽略。因此，有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行为，提出社区成员的社会实践是语言交际的重要情境。纵观社会语言学发展的简史，社会语言学虽然提出了语言是一个有序异质的系统，将语言变异现象列为研究重点，致力于揭示语言与社会的共变机制，然而从学者们对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的争议不难看出，以往崇尚定量统计的社会语言学范式，即言语社区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认为群体具有区别性特征。这是一种静态的立场，而忽略了构成言语社区的单位——“人”的能动性。言语社区的主体因素是社会中的人和语言行为，言语社区中的语言事实反映的是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由“人”和其语言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研究言语社区内语言与社会的共变规律，除了观察和描述语言事实，同时还应该观察社区中“人”的行为，关注这些成员是如何通过使用语言的实践，动态地建构起一个语言群体。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席卷了世界各个领域，使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缩短了异文化之间的距离。全球化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指随着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使人类的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

起。全球化催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现象，语言也不可避免深受全球化的影响，这表现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多元，人们使用的语言的结构、对语言的选择、使用和相关认同都会因此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现象被称为“全球化社会语言现象”。这些新的社会语言学现象的主要表现有三个：①全球化对移民、移民社区及其语言模式的影响。最显见的例子就是在全球化互联网生活中，人类不再锁定于某个固定的空间，坐在办公室前、网吧里就能通过互联网跨越广阔的空间与他人进行交流，进行跨国跨地区迁徙也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城市移民的语言多样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使得移民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沟通设备（如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用母语与祖籍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全球化还催生了许多城市移民社区，例如，一国发生政变导致本国难民的外流和迁徙，以及跨国留学和劳务人员的流动等事件，都能使移居国城市形成群体组织形式的本地土著居民语言与外来移民语言混杂使用现象。与此同时，移民社区中全球性语言的使用，也催生和酝酿着新的语言变体和语言使用模式的形成，塑造着新的多语模式，更创造着新的语言保持机会（Mufwene, 2008）。②少数群体的语言模式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面临濒危和消失。21世纪的全球化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英语在全世界的广泛接受和传播，改变了全球语言的层级秩序，这使得移民社区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人的方言开始面临窘境。这些群体以往保持的多语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大”语言变得更“大”，“小”语言变得更“小”。加上互联网的冲击，一些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方言）面临着强势语言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正处于逐渐被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境地，语言保持和丧失正在面临新的研究课题。③一些群体出于自己的经历和期待，对能否成功参与全球化过程表示严重怀疑，由此对全球层面的活动和全球化语言说不，反而更加拥护地区层面及其语言变体。例如，语言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法国根深蒂固，直到在2015年以前的几个世纪里，法国人都在本民族语言的纯粹性的战场上东征西战，对包括英语在内的各种“野蛮语言”进行全方位的围剿，英语及其文化在法国国内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强硬抵制和仇视。此外，

一些民族不但在欧洲发起运动，他们要求地区语言在法律保护下得到承认，甚至周游全球，跟踪并批判各国政府商议的全球化举措，形成反全球化运动的话语。

近些年来，社会语言学家开始尝试对这些新的社会语言学现象进行探索，试图更新和修正现有的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全球化社会语言学”正是为了研究这种新现象而出现的新理论(Blommaert, 2010)，它以荷兰学者 Jan Blommaert 为代表，形成了欧洲社会语言学派。Jan Blommaert 在 2010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的专著，我们姑且把它称作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研究全球化语境作用在社会的不同层面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即探讨语言符号及其相关的综合体的流动性：具体的语言形式、语言种类、文本、图像及其体裁、风格穿越时空的旅行。它们作为特殊的语言变体进入成批的特殊团体，为这类团体创造新的符号和商品提供机会进而把它们建设成为新的团体。该理论创建了一些新的以“移动”为常态的研究范式(Blommaert 和 Dong, 2010)，并且由这些新的范式衍生了一系列新的概念(Blommaert, 2007a、2007b、2009、2010)。这些概念的核心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突出“移动性”，都强调全球化影响的人是倾向于移动而非变动不居的，语言与人的关系是或提供或剥夺了人们移动的可能性。更具体地说，就是人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在社会空间中的移动，或者借由使用某种全球化的语言，拥有了移动的能力或潜力。与此相伴的是，语言通过移动的人的使用，其在社会语言格局中的地位也会发生着变化，由此也拥有着移动的潜力和可能性。人们学习某种语言，是因为它提供了移动的潜势。另外，语言和图像等符号本身也可以跨越时空、言语库和社会指向(social indexicality)而移动，并改变形态。因此，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移动性”。“移动性”概念提出了有待探索的两大课题——语言的移动潜势、移动的人与移动的语言(Blommaert, 2010)。而这恰与社会语言学的另一种研究范式“实践共同体”一直以来强调的重点不谋而合，即两者都关注动态的人和动态的语言实践。

汉语国际传播是全球化社会语言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构成语言传播的关键要素是传播者、信息和接受者，而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传播与其他全球化现象一样，都以移动性为主要特点，即主要取决于移动的人(传播者)和移动的语言(信息)。本书认为，如果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在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开展，立足于说汉语的人——华人移民，或许能有一些新的发现，而这也正是本书研究和写作的初衷。

第二节 华人移民：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样本

本书选择华人移民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旨趣，反映了研究的出发点，即“移动”的人和“移动”的语言。

一、华人移民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变化

在阐述华人社区之前，我们先要来了解中国人的移民历史。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可追溯到 2000 多年以前的先秦。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域，有船舶东航到日本，其中有人就会留居他乡。进入唐代以后，有更多的中国人定居国外，这可视为华侨史的开端。纵观 1300 多年来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华人移民前期，为海外华侨逐渐出现的时期，时间跨度为唐代到南宋(618—1270 年)。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而东南亚各地仍然比较落后，于是有不少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各地从事贸易。其中有一部分人便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第一代的华侨。这个时期的华侨大多居住在今天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人数大约为 10 万人。

第二个时期为古代华人移民后期，是华侨大量增加和华侨在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基础逐渐确立的时期，时间跨度从元代至清代中叶(1271—1840 年)。这个时期，明朝海禁开放，促进了海外贸易的

进一步发展。东南亚部分地区已变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贸易中转地，迫切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手工业品，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商人和破产的农民、渔民和手工艺人出国，加之明朝太监郑和率两万多人的船队七下西洋，历访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谊，也为中国人出国经商和移居国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个时期，东自日本、朝鲜，西至印度东部海岸，北起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至印度尼西亚群岛，几乎到处都可见到华侨。至鸦片战争前，海外华人总人数已达到 100 万以上（陈碧笙，1991：170）。

第三个时期为近代移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出国规模最大、散布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深的海外移民时期，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1841—1949 年）。这个时期华人劳工成为移民的主体，商业移民和政治性移民次之，而且这时，华侨出国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遭遇之苦，均属前所未有。依照“推”、“拉”理论的解释，这种规模空前的海外华人移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的加深，农村自然经济的日渐解体，下层民众的日益贫困化以及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大量劳工需求等内外因素剧烈作用的结果。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战争不断、经济破产，导致民不聊生，百姓急于寻找生路。而此时正值国外帝国主义日渐强盛，其在海外的殖民地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开发，于是一批批“契约华工”（俗称“猪仔”）被贩卖出洋，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移民的主要方式。这种贩卖活动始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期达到高潮，20 世纪初趋于衰落。在这 100 多年间，中国约有 700 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初步奠定了今天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这个时期的华侨人数已达 1200 多万人。根据华工出国的历史，近代中国海外移民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9 世纪 40—70 年代为移民高涨阶段，这时期华工出国合法化，“猪仔”贸易盛行；19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为移民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限制及排斥华工的政策，中国劳工移民更集中于东南亚；第三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23 万华工赴欧又掀起了一个出